

最“壕”世界杯背后的政治账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副研究员 金良祥

世界杯正在卡塔尔火热进行中。而从卡塔尔赢得2022年世界杯主办权的那一刻起,就不断有西方媒体批评卡塔尔举办世界杯的“能力和资格”。相关争议,到底是西方根深蒂固的偏见,还是西方不能接受由一个阿拉伯国家主办如此重大的赛事?本版特请专家解读。

——编者



金良祥

1 渴望摆脱“土豪”人设

问:卡塔尔为举办世界杯不惜投入巨资,究竟出于哪些方面的主要考虑?

答:为举办本届世界杯,东道主卡塔尔投资了约2200亿美元用于场馆和交通等基础设施建设,总额超过此前八届世界杯投资总额。巨额投入既是卡塔尔等海湾产油国“土豪”行为逻辑的体现,也是其致力于提升国家形象和扩大国际影响意图的反映。

在海湾地区盛传一则关于卡塔尔前任埃米尔哈马德的故事,虽无法证实,但并非没有事实基础。相传哈马德在英国留学期间,常被问到来自哪里,当提到卡塔尔时,几乎没有人知道。当时的卡塔尔,虽然已经因为石油收入而富甲一方,但领土仅有1万多平方公里,人口也仅15万左右,影响力和知名度都不高。富有但无人知晓的窘境深深地触动了哈马德,成为其后来立志让卡塔尔成为世界上家喻户晓的国家的动力。1995年6月,由于不满其父在国家发展方面踟躇不前的状态,哈马德趁其出访瑞士的时机发动政变,并取而代之。

1995年掌权之后,哈马德主政之下的卡塔尔积极主办并参与重大国际会议、活动和事件,包括创办在阿拉伯世界最具影响力的半岛电视台,主持世界贸易组织多哈回合谈判,举办2006年亚运会,以及为美国和阿富汗塔利班谈判提供场所等,使得卡塔尔的国际知名度和政治地位逐步得到提升。

2013年以后,顺利继位的现任卡塔尔埃米尔塔米姆延续了其父致力于提升国家影响力的战略思路。由于足球世界杯是一项极具人气的全球性体育盛事,申办和举办世界杯合乎逻辑地成为1995年以后卡塔尔提升知名度的战略举措之一。如其所愿,在父子两任埃米尔的精心推动下,方圆有限的卡塔尔成功吸引了世界的目光,成为全球当下的焦点。

上述故事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反映了卡塔尔以及周围的海湾产油国一度在国际上共同面临的类似境况,即凭借油气资源一夜暴富之后,它们都希望获得与其自身经济地位相对称的知名度、政治地位和国际影响力。为此,阿联酋建设了世界上最为豪华的所谓“七星级”酒店,建设了世界上第一高楼迪拜哈利法塔。阿联酋也将积极举办重大国际活动视为提升影响力的重要手段,2021年阿联酋举办了迪拜世界博览会,2023年还要举办《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方峰会。

沙特作为海湾国家的“盟主”自然不甘落后,王储小萨勒曼2017年掌权之后在外交上也更为积极,提出了“2030年愿景规划”,致力于将沙特打造为最先进的国家。目前,沙特正在投资5000亿美元巨资在沙漠打造一座170公里长、200米宽、500米高的超现代城市,并正在申办2030年世界博览会。王储的改革还显著改善了妇女地位,沙特女性可以自由上街,考取驾照,参加工作。

2 西方攻讦暴露偏见

问:如何看待西方舆论对卡塔尔世界杯的攻讦?

答:自2010年国际足联宣布卡塔尔赢得2022年世界杯举办权开始,西方对卡塔尔的批评便不绝于耳,而世界杯的哨声响起之时,正是西方批评之声达到高潮之时。英国BBC甚至切换开幕式直播,改为直接批评卡塔尔的人权问题。总体而言,近期西方主流媒体的批评主要集中在世界杯场馆在建设过程中外籍劳工的权益被忽视的问题。这些问题虽然存在,但西方的批评更多地反映了西方自身的狭隘和偏见。

所谓的外籍劳工问题在卡塔尔及其他海湾产油国的存在由来已久,是一种特殊复杂现象。卡塔尔全国人口约为265.8万,其中土生土长的卡塔尔公民约为39万,约占人口总数的15%,其他绝大部分为外籍劳工,约占人口总数的85%。上述独特、畸形的人口结构,不仅卡塔尔是这样,其他海湾产油国也是如此,且已经维持了相当长的时间,未来可能仍将维持。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主要是这些国家经济的迅猛发展所产生的巨大劳动力需求,进而导致大量南亚和东南亚国家的外籍劳工涌入。

随着劳工的涌入,自然而然便产生了外籍劳工的管理和权利保障问题,而海湾产油国管理外籍劳工的卡法拉制度则成为了卡塔尔饱受西方媒体诟病的主要问题。诚然,这种制度在一些舆论看来包含一些粗暴做法及不合理的规定,但卡塔尔方面也有自己的顾虑,如果没有严格的劳工管理制度,一旦外籍劳工发生了违法行为,然后一走了之,他们将面临困难的追责局面。

当然,卡法拉制度注定无法持续。2020年,卡塔尔开始允许所有

外籍劳工可不经雇主同意在合同结束前更换工作。卡塔尔还开始引入最低工资标准,并承诺对不遵守新法规的公司进行严厉惩罚。卡塔尔毕竟只是一个建国仅仅50余年、新近脱胎于部落社会的国家,管理和治理的现代化需要时间。国际社会有理由期待,卡塔尔在举办世界杯后将能更好地调整心态,进一步改善外籍劳工的生活条件。从这个意义上说,国际社会应该对卡塔尔面临的情况持历史性的、包容性的和发展性的视角。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西方的批评更多地反映了西方自身的狭隘和偏见。任何一届重大体育赛事都不可能做到十全十美,卡塔尔的不足不应成为西方过度批评的理由。纵观近二十年来非西方国家举办的各种体育赛事和重大活动,几乎没有哪一场活动没有被西方猛烈批评。对己方举行的各种体育赛事,西方媒体却鲜有批评之声。西方俯视非西方国家的心态,由此可见一斑。

3 盛会产生四大影响

问:本届世界杯将会给卡塔尔以及海湾地区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答:本届世界杯将会在诸多方面产生深远影响,尤其是以下几点:

一是将极大地提升卡塔尔所代表的文化圈内国家的自信。足球世界杯是一种兴起于西方、盛行于全球的重大体育赛事,虽然历时将近百年,但从未在阿拉伯国家乃至整个伊斯兰世界举办过。通过举办本届世界杯,拥有海湾产油国、阿拉伯国家和伊斯兰国家三重身份属性的卡塔尔向世界证明,他和兄弟国家有能力举办全球性重大体育赛事。

阿拉伯国家和伊斯兰世界长期面临西方各式的强大压力,甚至遭受欺辱,特别是“9·11”事件以后的二十年间,西方国家的言行极大地伤害了他们的情感和尊严。本届世界杯虽未结束,但沙特、摩洛哥和伊朗等国参赛队均有亮眼表现,极大地激发了阿拉伯和伊斯兰世界的集体荣誉感和自信心。阿拉伯国

家近期流传的网络语言“我是阿拉伯人,我支持卡塔尔”,表达的不仅是团结,更是作为阿拉伯人的自信。

二是增进了海湾和阿拉伯国家的团结以及中东国家的和解。2017年卡塔尔多断交危机让阿拉伯国家的内部矛盾公开化。2021年1月,相关各方签署《欧拉宣言》,上述危机才得到缓解。本届世界杯上,沙特王储兼首相小萨勒曼特意取消访问日本的行程,前往卡塔尔参加世界杯开幕式,象征着海合会国家已经冰释前嫌。此外,埃及总统塞西、约旦国王和巴勒斯坦总统等阿拉伯世界重要领袖均出现在开幕式上,各大媒体还捕捉到埃及总统塞西和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握手相谈甚欢的场景。场外,巴勒斯坦和以色列的球迷搭乘同一架航班飞抵多哈,巴以民众之间出现了鲜有的温暖画面。历史将记住卡塔尔世界杯为促进海湾地区和阿拉伯世界的团结,以及中东国家的和解所做的贡献。

三是提升了卡塔尔和海湾国家的影响力。近年来,卡塔尔及其他海湾国家在国际舆论引领、美国与阿富汗塔利班谈判,以及俄乌冲突中表现出一定的国际影响力,世界杯巨大的广告效应更极大地提升了卡塔尔在全球的知名度。其超现代的基础设施、别出心裁的开幕式,以及卓越的赛事组织能力随着电视直播为全球观众所知晓,打消了国际舆论一度存在的对其能力的疑虑,也在一定程度上破除了国际社会特别是西方国家对海湾国家“土豪”的刻板印象,极大地提升了卡塔尔乃至海湾国家的形象,提升它们在国际舞台上的政治地位。

四是有助于卡塔尔和海湾国家推进全面现代化。卡塔尔等海湾国家虽然富庶,经济结构却相对单一,尚没有实现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化。世界杯之后,卡塔尔将在打造地区乃至全球性旅游目的地、购物中心、物流中心、航空枢纽以及金融中心上表现出竞争优势,并将其经济影响辐射周边地区。海湾国家也将作出更多积极的改变,推进全面现代化。



应对西方滥用“国家安全”需要精准反制



沈伟 复旦大学网络空间国际治理研究基地主任

日前,英国政府以“安全风险”为由,要求政府部门停止在敏感建筑上安装中国企业制造的监控设备。11月26日,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又发布文件,以所谓“保护美国通信网络”为名,禁止华为、中兴等中国企业在美销售。对此,我们应该怎么办?

恶性循环 损人不利己

简单来说,这一现象背后凸显出的,是美西方国家在病态的安全

焦虑刺激、极端不自信和自我恐吓之下,陷入了滥用国家安全理由、构建具有显著歧视性的保护体系,试图迟滞中国崛起、宣泄内生负面情绪的恶性循环。

此类做法明显是损人不利己:一方面,损害了包括英美国企业在内从事正常贸易活动的企业的客观利益,并不能够起到“损中国,补西方”的效果;另一方面,对全球正常的商业活动也会产生长期的不良影响,严重违反市场原则和国际贸易规则。

滥用“安全”三方面因素

由此产生的问题是,在经过熟练的利益精算之后,为什么美西方国家的政客还会持续不断地采取这种损人不利己的政策呢?至少有三个方面的原因:

其一,是成本与收益的非同步

性。对不少西方政客来说,做出上述决定能够在短期甚至瞬时在国内收获所谓政治上的收益。由于当前西方国家普遍深陷“恶斗性国内政治”的泥潭,所以许多微小的短期政治收益都是其不惜一切代价所要争取的。然而,由此带来的成本并不是同步发生的,通常具有滞后性和分散性。正所谓“我死之后哪怕洪水滔天”,对这些西方政客来说,只要相应成本不立刻爆发,那么这种成本,哪怕是国家利益的实质性损失,也是可以忽略不计的。

其二,是深刻植根于政治基因之中“祸水外引”的本能。英国著名电视连续剧《是,首相》中,有一集名为“驱逐76名苏联外交官”。在这一集中英国首相由于国内问题被媒体穷追猛打,内阁秘书建议其通过驱逐76名苏联外交官来转移媒体的注意力。可以说,上述中国企业

在美西方国家的遭遇,凸显了这种由西方日趋恶化的政治生态所催生的“祸水外引”本能。

其三,是对中国企业和政府善意的肆意利用。无论是中国的政府还是企业,更多地愿意从长远利益的角度出发,以更加负责任的态度去处理相关事务。但令人感到遗憾和无奈的是,中方的善意总是遭到美西方国家,尤其是英美两国政府没有底线和节制的滥用。美国政府的部分成员甚至形成了一种错误的认知,认为“美国负责捣乱,中国负责负责任”,将维持两国关系的正常运行当成了中方单方面的义务,继而以此谋求无限制扩展己方的利益。

精准反制 整体性实施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无论是中国企业还是中国政府,都需要认清这样一个现实:当英美政府陷入这

种近似癫狂的焦虑心态之后,讲道理是需要一定的前提和条件的,即用对方能够理解的方式,明确地让对方为错误行为付出必要的代价。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英美两国都具有符合美国外交家乔治·凯南叙述的行为逻辑,即对理智的逻辑不敏感,但对于实力的逻辑非常敏感,它们乐意将自己的影响力扩展到权力盆地的每一个角落,直到遇到无法逾越的边界为止。用更通俗易懂的话来说,就是“瞪鼻子上脸”“给三分颜色就开染坊”。

这种对中国企业不利的局面,不是企业可以单独解决的问题。这需要中国作为一个国家,整体性地实现精准反制,用对方能够理解的语言和方式让对方清醒过来,进而才有可能实现中方善良的意愿,也就是让包括经贸往来等双边关系回到健康和良性的轨道上去。